

全球智库半月谈

过度负债的欧洲视角

全球失衡新表现

金融危机以来的银行改革

中国银行业：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使大银行受益

美国会丧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遇吗？

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刘立群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谢晨月

伊林甸甸

杨 茜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过度负债的欧洲视角 7

导读：本文认为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在于（1）错误的估计货币联盟可能出现的危机程度和类型；（2）政府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欧元区应该实施如下改革：第一，市场纪律的重要性，降低隐性担保带来的风险承担；第二，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制，降低对银行的依赖；第三，创造一个激励相容的财政体系。

脱欧与国际贸易：写在公投一周年 9

导读：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对外贸易关系？相关局势仍不明朗。无论是和欧盟的关系还是和世贸组织的关系，英国都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与此同时，两个组织现有框架内都没有处理相关情形的前例可以被借鉴。对于英国和欧盟、WTO来说，有关机制还需要被不断探索。

中美贸易政策未来 11

导读：在特朗普总统寻求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则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国及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为区域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持者。中国意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它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区域自由贸易以及区域共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鉴于中国将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中美贸易不应是一场零和游戏。

全球失衡新表现 13

导读：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外部门报告强调了持续存在的不平衡和转向发达经济体的失衡问题。我们回顾了经济学家们最近对这一主题的贡献。

美联储陷入长期停滞 16

导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9月20日宣布，保持利率不变，从10月开始缩减4.5万亿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过，美联储的耶伦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对今年早些时候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感到担忧。如果未来三个月通货膨胀率没有回到2%的目标，正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目前预期的那样，加息可能会被推迟。

经济政策

央行数字货币与未来的货币政策 18

导读：世界各地的央行正在考虑发行主权数字货币，这些货币可以从各个方面改变货币体系，促进货币政策实施的系统性和透明性。特别地，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实际上可以

作为一种无成本的交换媒介、一种安全的价值储藏和一个稳定的计价单位。为实现这一目标，数字货币需要以账户为基础并付息，货币政策框架应该以真实价格的稳定为目标。

金融危机以来的银行改革 21

导读：从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发表的观点来看，自 2008 年改革以来，我们在限制银行杠杆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学家的大多认为巴塞尔协议 III 的内容还远远不够。本专栏认为，相对于巴塞尔协议 II 来说巴塞尔协议 III 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巴塞尔协议 III 只是改进了巴塞尔协议 II，而不是银行监管的终点。

聚焦中国

中国银行业：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使大银行受益 23

导读：随着中国领导层对去杠杆化目标规模的不断上升，银行面临更多来自监管机构的限制。因此，在不断发展的法规面前，银行开始进行非常有创意的“猫鼠游戏”。

战略观察

美国会丧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遇吗？ 26

导读：今年 11 月，特朗普总统即将展开对亚洲多国的国事访问。尽管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期待，特朗普至今却还尚未表态是否会访问东南亚国家。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及其内阁缺乏对东南亚事务的重视呢？作者认为，特朗普及其内阁有必要做出切实行动，来加强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否则，美国就有可能丧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遇。

特朗普怎样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29

导读：近一段时间以来，朝核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半岛局势似乎正在朝着不稳定的方向迅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如何采取战略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美国又有哪些方案可以选择？作者给出了分析。

朝鲜核试验蔑视特朗普的“怒火” 32

导读：2017 年 9 月 3 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此次试验朝鲜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特朗普“怒火”警告言辞的反抗。2017 年 9 月 5 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朝鲜核试验蔑视特朗普的“怒火”》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特朗普“怒火”言辞兑现与否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行第二次制裁后，中、美、俄将要面临的状况；尤其是美国在承认朝鲜是核国家与进行“灾难性”军事冲突之间的两难选择。

美国对朝政策的下一步 34

导读：朝鲜在 7 月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这两次导弹试射表现出了似乎可以打击美国的军事实力。随着朝鲜威胁的上升，美国宣布放弃战略耐心做法。本文作者认

为，考虑到金正恩的主要关切在于政权生存，在放弃战略耐心做法后，美国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军事行动威胁和散布破坏朝鲜内政的信息，以此说服金正恩回到谈判桌，使其认识到放弃与国际社会合作对其政权生存并无益处。

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 37

导读：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特朗普借朝核试验的余热未退，于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讲话，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朝美对话的关注。2017年9月22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朝美关系的发展进入沸点状态、特朗普与金正恩存在巨大的沟通风险以及朝美终将继续对话等内容。

本期智库介绍 39

过度负债的欧洲视角

Nicolas Véron 和 Jeromin Zettelmeyer /文 郭子睿 /编译

导读：本文认为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在于（1）错误的估计货币联盟可能出现的危机程度和类型；（2）政府对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欧元区应该实施如下改革：第一，市场纪律的重要性，降低隐性担保带来的风险承担；第二，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制，降低对银行的依赖；第三，创造一个激励相容的财政体系。编译如下：

欧洲过去十年是研究者分析过度负债和去杠杆的最佳例子。从爱尔兰到土耳其，从伦敦到波罗的海，以及整个欧元区，杠杆率都在飙升。2012年3月雅典甚至发生了主权债务重组，这是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的第一个主权违约的案例。本文聚焦于欧元区危机，主要分析信贷风险管理以及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欧元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欧元区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大缓和”时代。与美国金融危机类似，欧元区危机也是由于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对金融部门风险的忽视。但欧元区积累的过度风险又不完全和美国相同。美国的风险积累主要发生在居民房地产部门。人们认为房地产的下滑只是局部性，不可能蔓延到全国。欧元区的风险积累主要发生在缺乏纪律约束的银行和政府部门。相较于美国，欧元区相对较少依靠金融创新，其风险承担机制主要包括：（1）错误的估计货币联盟可能出现的危机程度和类型；（2）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隐性担保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如果一个国家陷入了麻烦，其它成员国都要出手帮助。大多数成员国都认为自己的银行不会破产，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危机应对方案。即便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向其它国家求助。

在2007年欧元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积累的风险部分源于对欧元区金融体系的过度乐观，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视而不见，另一部分源于隐性担保。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之前一直认为的高风险公司，如私募股权投资和对冲基金，并不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源。而之前一直认为比较安全的银行体系，却带来了系统性风险。

危机反应与政策应对

欧元区危机的导火索是银行体系大量持有美国房地产的次级债。当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很多银行如德国，法国的以及其它银行都深受影响。接下来批发性资本市场的动荡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融资条件和环境，一些银行由于资不抵债相继破产。

但是，对于分析师，政策决定者以及更广泛的民众直到多年之后才对银行体系的破产类型和危机程度达成一致。对于银行体系问题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源于银行的政府化以及银行存在的隐性担保。当欧元区某一个国家发生破产或者危机时，其它国家的帮助会加剧成员国的道德风险。

结论

文章分析了欧元区危机之前不断积累的高债务，过去应对危机的方案以及如何改革使欧元区的制度框架更加有弹性。当前，危机管理框架和更宽泛的改革措施还在推进。我们认为如下三点是应该及时吸取的教训：

第一，市场纪律的重要性，降低隐性担保带来的风险承担。欧元区成员国在无法进入国际主权市场时，仍可以获得其它成员国的救助，这会加剧他们的风险动机。欧元区成员国需要提高他们银行以及银行与政府之间的透明性。

第二，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制，降低对银行的依赖。当经历银行业危机时，可以降低风险，减少损失。这也可以解释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金融体系在经历危机之后可以较快的反弹复苏，而以银行业为主导的欧元区在经历危机之后将近10年还没有复苏。当前的欧盟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改革，但完全付诸实践还需要时间。

第三，创造一个激励相容的财政体系。在欧元区，破产国家会带来巨大问题，不止是因为他们的银行部门联系在一起。关键的原因还有欧元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忽视了私人部门高债务可能带来财政问题。当前的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根据自己的状况实施财政政策。这导致各个成员国无法进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只有货币联盟而没有财政联盟的欧元区长期来看，是否具有弹性或者可持续性，值得商榷。

本文原题为“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overindebtedness”。本文作者 Nicolas Véron 是 Bruegel 和彼得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Jeromin Zettelmeyer 是彼得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7年9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脱欧与国际贸易：写在公投一周年

Valerie Hughes /文 申劲婧/编译

导读：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对外贸易关系？相关局势仍不明朗。无论是和欧盟的关系还是和世贸组织的关系，英国都还没有明确的打算。与此同时，两个组织现有框架内都没有处理相关情形的前例可以被借鉴。对于英国和欧盟、WTO 来说，有关机制还需要被不断探索。编译如下：

尽管距离英国脱欧的公投已经过去一年，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尚未对许多能影响到与欧盟及欧盟外国家的国际关系做出安排。随着英国正式脱欧的倒计时——2019 年 4 月的快速临近，英国未来贸易伙伴关系，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体量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近来欧盟和世贸组织所做的一些法律上的决定可能会为日后贸易谈判者和法律顾问提供有用的指导。

首先，2017 年 5 月欧洲法庭公布的一项主张为欧盟内缔结一个涉及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思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交易，投资及其他领域。尽管这项主张是在欧盟-新加坡自贸条款中被提出，这些发现实际上总体上阐明了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的竞争力，因此对欧盟在未来可能进行的任何贸易条款商定都非常相关，包括与英国的商议。其次，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一个涉及到中国-欧盟贸易的 WTO 争端解决会议报告涉及到契约义务和让步，为对 WTO 条款的解读及其成员国时间计划安排的调整提供了罕见的指导。

这个会议报告只涉及到中国与欧盟，但是其中谈到的修正条款和程序总体上对那些想要修改自己未来 WTO 时间计划的 WTO 成员国非常有意义。尽管英国是 WTO 的一个独立成员国，但是却没有自己单独的计划，而是被包括在欧盟的计划之中。脱欧之后英国是会继续在欧盟计划的框架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力并适时调整，还是会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计划，一致性的意见尚未被达成。如果是后者的话，WTO 最近的会议报告将对这一实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WTO 现有的框架内没有能处理英国脱欧之后在其中位置的机制。目前，英国未来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尚不明朗，但这无疑将是未来英国与 WTO 关系的风向标。要达成广泛认同的英国独立的时间表，英国与其他 WTO 成员国可能需要在 WTO 现有的关于商品和服务计划的条款框架下寻求额外的指导。尽管如此，就算其他成员国选择以现有条款处理英国问题，对在这一过程正式开展后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可能也没法提供满意的回答。

处理后脱欧时代与英国有关的计划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WTO 判例法中鲜有对有关问题的指导。然而，最近发布的欧盟乳制品及肉类会议报告为英国及其他成员国可以寻求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一些指导。

就目前来看，2016 年 6 月的世界贸易研讨会上的一段发言仍然是适用的：“我没有能预知不断变化未来结果的水晶球，其他人也没有”。确实是这样的。

本文原题为“Brexit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ne year after the referendum”。本文作者 Valerie Hughes 在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国际贸易法律，2010 到 2016 年曾任 WTO 法律事务部部长。本文于 2017 年 9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政策未来

Colin Grabow/文 安靖宜 / 编译

导读：在特朗普总统寻求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则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中国及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为区域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持者。中国意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其它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区域自由贸易以及区域共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鉴于中国将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中美贸易不应是一场零和游戏。编译如下：

在白宫近期会议中，特朗普总统清楚地阐述了他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看法。据报道，他对白宫参谋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称，“我想要关税，我需要有人向我缴纳关税”。

截然不同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则认同自由贸易法案。“追求贸易保护就像是把一个人锁在黑屋子里”，他今年早些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如是说。“当风雨被阻隔在外的时候，这间黑屋子同样也阻隔了阳光和空气”。

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代表着贸易史的变革。回溯到 1934 年的贸易相关法，美国就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而中国在过去大多数时间则较为封闭。

但是，近期两个国家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尽管中国的贸易措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中国的领导人似乎在努力促进经济和贸易增长。除了习近平在达沃斯的发言，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包括李克强总理）的发言中大多数都指向开放的贸易政策。

而中国的决心似乎不仅体现在领导人的发言上。中国宣布了和加拿大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探索性谈判，及与新西兰拓展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案。

中国政府致力于贸易自由，但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仍待协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囊括了中国、奥地利、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以及东盟十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被视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竞争对手，而后者的地位随着特朗普的不知所谓的退出显得摇摇欲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代表着有限但会真实有效的区域自由贸易进展。

自由贸易的好处是显著的，据亚洲发展银行估计，过去 10 年间全球收入增长到 2600 亿美元。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出炉，亚洲—跨太平洋经济合作论坛成为了促进区域自由贸易的正式途径。

同时，随着额外贸易目标的提出，中国也寻求着区域共同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和它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推动，意在推动亚洲和其它欧亚大陆国家的基础设施联系。确实，据亚洲发展银行计算，到 2030 年，

本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至少会投资 1.5 万亿美金来发展基础设施——这一数字比目前的 9000 亿要大很多。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 David Dollar 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将会为贸易和投资提供“硬件”支持，这一概念是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软件”支持相对应的。

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已成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如何利用它的新地位。尽管中国强调的东西不可完全相信，但是进行最坏的预期似乎也不明智。如果中国违反它应遵守的国际协定，那么各国就应该通过多边行动对其进行制裁。如果中国协助承担全球责任，那么它的贡献也应被肯定。

美国和其它国家也应铭记，符合中国利益的协定也可能符合其它国家的利益。确实，很多美国的法案都使用了相同的思路。某些现象显示，中国将会逐渐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认为中美之间存在零和博弈。或者说，一场全面的改变迫在眉睫。

本文原题为“China and the US: trading places on their trade positions?”。本文作者 Colin Grabow 是 CATO 高级研究员。原文于 2017 年 9 月发表在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失衡新表现

SILVIA MERLER/文 侯书漪/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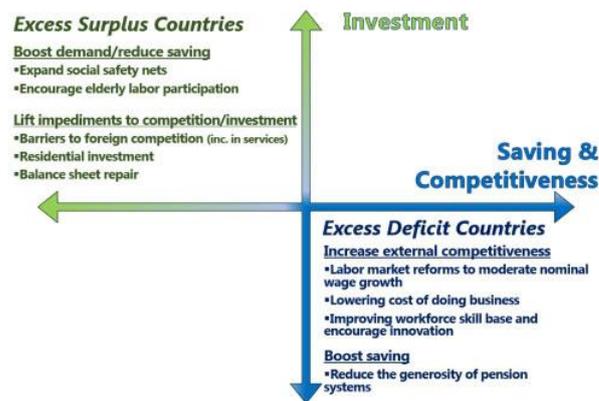
导读：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外部门报告强调了持续存在的失衡和转向发达经济体的失衡问题。我们回顾了经济学家们最近对这一主题的贡献。编译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的对外部门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状况基本保持不变。2016 年，全球经常账户的过度失衡（即赤字或盈余偏离理想水平）占到全球失衡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发达经济体。持续的全球过度失衡表明自动调整机制十分薄弱。虽然过度失衡转向发达经济体可能使得短期内赤字融资的风险较低，但赤字集中在某几个经济体会带来风险更大的破坏性贸易政策行动。

IMF 指出，由于大多数系统性经济体的产出缺口近乎封闭，想要以有益于增长的方式解决外部失衡就需要重新调整赤字和盈余经济体的政策。过度赤字国家应该通过进行财政整顿而有所改善，同时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逐渐使货币政策正常化。过度盈余的经济体应减少其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并允许更多的财政刺激。在货币政策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选择能促进相对价格调整的财政和结构性政策。

Reforms needed

Both deficit and surplus countries should focus on reforms to boost growth while reducing excess external imbalances.



Note: Reforms need to be tailored to country-specific circumstances. See the IMF's 2017 External Sector Report for country-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dler 和 Cubeddu 指出，除了石油出口国和金融中心之外，过度失衡的扩大和持续盈余的存在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目前的过度失衡表明，价格、储蓄和投资决策调整的速度还不够快，无法及时纠正失衡的问题。这部分地反映了刚性汇率安排，但也反映了导致一些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不理想的结构特征（如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和投资壁垒）。赤字集中在某几个国家提高了实施保护主义的可能性，而继续依赖于债务国的需求有可能会妨碍全球经济复苏。这样看来，找到一个解决失衡问题的通用办法是避免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独立行事、破坏稳定增长的共同利益的关键。

《金融时报》的 Rick Rowden 认为，IMF 的想法错了，国际体系的错误架构才是令人担忧的全球经济失衡会定期出现的原因。目前的国际体系是在以不对称的方式运作，将调整的负担完全放在赤字国家身上。同时，盈余国家被认为是“获胜者”、应被效仿。Rowden 认为，IMF 不应将整个调整的重担完全放在赤字国家上，而应该支持凯恩斯关于建立协调统一、共同应对国际失衡的机制的建议。

Otaviano Canuto 认为，尽管并不会威胁到全球金融的稳定，但失衡的再次出现显示出全球经济在预售产品和就业方面的表现不佳，即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尚未达到其潜在可能的速度。要说“全球失衡时代”已经结束可能还为时太早，凯恩斯关于赤字与盈余经济体之间调整负担不对称的论点仍然很符合现实。IMF 的报告要求，应该将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转移措施“重新调整”到需求支持措施，对于目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且主要依赖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国家（或整个欧元区）来说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国家财政政策可以提供的跨境需求拉动效应是有局限的，像德国或美国的企业利润那样巨大的储蓄流动可能很难进行重新配置。

Ueda 和 Monge-Naranjo 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失衡现象。根据自 1845 年以来的历史数据，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球失衡的交替波动是随着连续的工业革命而产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往往会积累外国资产。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个事实，即将 Lucas 的顺序工业革命模型应用于开放经济体系，并与购买消费品的硬通货约束相结合。

Carmen Reinhart 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情况一直在变化，但有些东西并未改变。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进口国。自从美国在一战结束成为世界大国后，它就变成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资本供应国。在不同的时间段，美国经常会指责不同的国家：在 80 年代后期指责日本和韩国，而后随着货币操纵被归因于外部储蓄的上升，又指责中国和近期的德国。Reinhart

认为，美国经历了将近两代人的长期经常项目赤字，指责盈余国家这一手段已经过时了。有人问是否可以对盈余国家施加国际上的压力，使其多消费、少储蓄，但在二战结束，作为一个盈余国家的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时，这一疑问被毫不犹豫地驳回了。美国的税收政策以牺牲储蓄为代价助长了家庭的债务积累，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滑正在影响着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缺乏替代品，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依然没有受到挑战，美国很容易为其经常账户的赤字融资，但这虽是事实却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好方法。

Choi 和 Taylor 认为，由储备积累驱动的全球失衡的扩大可以帮助我们调查实际汇率是如何确定的。标准的教科书观点认为，如果外国净资产有所增加，实际汇率（RER）将会呈现稳定的趋势。他们认为，通过使用来自 75 个国家的最新数据、查看其储备积累可以推翻这一标准观点。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1975 年至 2007 年间，在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条件的情况下，私人外部资产与实际汇率的升值有关。然而，公共外部资产对财政开放国家的实际汇率几乎没有影响，但与财政封闭国家的实际汇率贬值有关。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由两方面力量驱动的预防和重商主义动机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结果：一方面是将准备金作为预防性储备来抵御危机损失和资本市场资金流入放缓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当存在出口导向型增长外部性时，希望使用实际汇率和资本账户政策、通过贸易顺差来强制进行外部储蓄。

本文原题为“Global imbalances”。本文作者是 Silvia Merler，她于 2013 年加入 bruegel，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宏观金融经济学、中央银行以及欧盟的机构和政策制定等。本文于 2017 年 9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陷入长期停滞

Joseph E. Gagnon/文 杨茜/编译

导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9月20日宣布，保持利率不变，从10月开始缩减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过，美联储的耶伦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委员会的成员都对今年早些时候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感到担忧。如果未来三个月通货膨胀率没有回到2%的目标，正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目前预期的那样，加息可能会被推迟。编译如下：

正如市场的广泛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9月20日宣布，保持利率不变，从10月开始缩减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然而FOMC委员们认为短期利率在长期会进一步下降。美联储似乎也赞同这一观点。根据美联储工作人员的研究，生产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的放缓将持续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中性联邦基金利率的估计从几年前的4.25%下降到今年早些时候的3%，现在只有2.75%。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接近1.25%，美联储正处于紧缩周期的中途。此外，由于FOMC借鉴了关于长期中性利率可能低至2%的研究，中性利率预期进一步下调。

资产负债表缩减机制在FOMC的6月公告中有所描述。由于其抵押担保证券已经到期并偿还，美联储已将所有收益再投资，将总资产保持在4.5万亿美元。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起始缩减规模为100亿美元，总资产将会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要再投资的到期和预付资产的数量将会下降，资产负债表以更快的速度缩减。

根据目前的计划，明年年底，资产负债表每月可能缩减500亿美元。FOMC没有表明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长期目标，维持在2万亿美元到3万亿美元的范围内似乎最有可能。衰退前的运作程序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约为1.5万亿美元，但大多数评论员预计美联储将保持明显高于以前制度的银行储备，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缩减资产负债表会收紧财政状况，因为它会增加市场上长期债券的数量，从而提高收益。鉴于市场对这一决定提前知晓，债券的定价大部分已经包含这一预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20日仅上涨了2个基点（0.02个百分点），但在过去12个月中上涨了58个基点，部分反映了今天的预期。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前计划在12月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不过，耶伦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对今年早些时候核心通货

膨胀率的下降感到担忧。如果未来三个月通货膨胀率没有回到 2% 的目标，正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目前预期的那样，加息可能会被推迟。

本文原题为“The Fed buys into secular stagnation”。本文作者 Joseph E. Gagnon 为 PI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9 月刊于 PI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央行数字货币与未来的货币政策

Michael Bordo 和 Andrew Levin/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世界各地的央行正在考虑发行主权数字货币,这些货币可以从各个方面改变货币体系,促进货币政策实施的系统性和透明性。特别地,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无成本的交换媒介、一种安全的价值储藏和一个稳定的计价单位。为实现这一目标,数字货币需要以账户为基础并付息,货币政策框架应该以真实价格的稳定为目标。编译如下:

三世纪的罗马, Severus Alexander 的首席法律顾问 Julius Paulus Prudentissimus 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描述了政府发行货币的基本原理。他写道,货币是商品和服务的计价单位、是储藏价值的方法、是促进经济和金融交易的交换媒介(Watson, 2010)。Paulus 已经认识到货币的效用取决于名义数量,而不是物质本身,也即是,货币的效能取决于公众对当局货币体系管理的信心。

两千年后的今天,电子设备和高速网络几乎无处不在,包括欧洲央行、挪威银行和加拿大央行在内的中央银行正在探索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可能性。瑞典中央银行建立了加速的时间表以决定是否启动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试验技术规范;英国央行已经开展了多年的调查。

像纸币和硬币一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名义价格固定、普遍可及、在所有公共和私人交易中和法币一样有效。因此,CBDC 在本质上不同于私人实体所创造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和瑞波币,这些虚拟货币近年来市场价格波动剧烈(Scorer 2017)。

1、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

CBDC 应当制定一套设计原则,特别地考虑五个问题:

(1) CBDC 的支付是否应该在中央银行开立的账户之间进行,还是直接从付款人转移给收款人?

- 是否应该取消现金,或者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制定 CBDC 与纸币之间转账的费用表?
- CBDC 是否应该付息,是否应该根据总价格指数对 CBDC 进行指数化调整,而不是像现金和硬币一样具有不变的名义价值?
- CBDC 对央行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过程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 CBDC 如何影响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互动?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 CBDC 在实现任何公共货币基本功能方面的有效性——作为交换媒介的效率、作为价值储藏的安全性与作为经济和金融计价单位的稳定性。使用这些标准，我们能够确认一个拥有良好设计的 CBDC 应具有的特点：

- 几乎无成本的交换媒介。如果 CBDC 是以账户为基础的，那么账户可以直接在中央银行开立，或者通过有公私合作模式从商业银行获得。
- 安全的价值储藏。付息 CBDC 的回报率应该与短期政府证券等无风险资产收益率相当，CBDC 利率可以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 纸币逐渐淘汰。CBDC 可以广泛地为公众所了解，并应制定现金和 CBDC 之间转换的分等级费率表。这样，CBDC 利率的调整就不会受到有效下限 ELB 的约束。
- 真正的价格稳定。CBDC 的真实价值能够在广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方面保持稳定，这能促进货币政策实施的系统性和透明性。

2、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优势

作为几乎无成本的交换媒介，CBDC 将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例如，IMF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引入 CBDC 将有助于提升跨境金融交易的速度和安全性(He et al. 2017)。CBDC 对低收入家庭和小型企业格外有利，低收入家庭高度依赖现金，小型企业进行现金交易和付款时需要支付相对较高的费用。在宏观经济层面，英国央行的研究人员估计，采用 CBDC 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效果与减少扭曲性税收相近(Barrdear and Kumhof 2016)。

CBDC 的付息设计和纸币的淘汰也将有助于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利率对于极端负面冲击的调整将不会再受到有效下限的限制。

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消除现行货币体系中的零利率下限的好处，利率下限一直是许多中央银行目前设定 2% 或以上通货膨胀率目标的关键原因，然而 CBDC 将基本上使得维持这种通货膨胀缓冲没有必要，或者将有助于开展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如量化宽松或信贷补贴。

此外，如果经济下滑严重，CBDC 将有助于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Dyson and Hodgson (2017)指出，在经济低迷时，资金可以直接存入低收入家庭的 CBDC 帐户，减轻其购买力受到经济因素和 CBDC 利率的暂时负面影响。实际上，Friedman (1948)曾经也强调过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互补性。

以真实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与目前的通货膨胀目标有实质性的不同。如前文所述，大多数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在 2% 或以上，并且不考虑过去通胀水平与目标的偏离，所以总价格水平服从向上漂移的随机游走。

相比之下，尽管在价格水平的目标下，消费者物价仍会出现短暂的波动，但货币政策将确保总价格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目标水平。家户和企业能够相信一篮子代表性消费品（根据 CBDC 计算）的成本在中期保持稳定，在未来的 5、10、20 年甚至 50 年大致稳定。这种稳定性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尤其有利，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根本无法获得精细的财务规划建议或复杂风险对冲金融工具。

CBDC 的广泛使用和纸币的废除，将减少逃税、洗钱和其他非法活动。这种好处对于在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现金导致逃税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CBDC 的可行性已经在厄瓜多尔展示，该国通过一个简单而安全的平台（手机和短信两步验证）使得 CBDC 能够广泛应用。类似地，肯尼亚政府建立了一个公私合营模式来提供低成本数字支付。

3、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的风险

鉴于支付技术的快速创新和虚拟货币的扩散，中央银行在 CBDC 方面采用被动应对的方式可能并不谨慎。如果中央银行不发行任何形式的数字货币，那么就会有失去货币控制的风险，因而考虑到这一点，央行在 CBDC 方面正在快速行动。

本文原题为“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and the future of monetary policy”。本文作者 Michael Bordo 为罗格斯大学经济学教授，Andrew Levin 为达特茅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9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金融危机以来的银行改革

John Vickers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从金融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发表的观点来看，自 2008 年改革以来，我们在限制银行杠杆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学家的大多认为巴塞尔协议 III 的内容还远远不够。本专栏认为，相对于巴塞尔协议 II 来说巴塞尔协议 III 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巴塞尔协议 III 只是改进了巴塞尔协议 II，而不是银行监管的终点。编译如下：

2007 年 8 月，银行间拆借市场开始停滞。北岩银行，作为一家国际化银行，其破产预示着全球经济，至少是北大西洋的经济体，即将发生危机。但大家不以为然，甚至接下来的贝尔斯登破产，也没有引起大家的警惕。事实上，从那时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已经不一样了。

杠杆问题：巨大的分歧

我主要讨论一下银行的杠杆问题——银行资金应该拥有的自有资本最小值是多少？杠杆问题是市场经济里最基础的问题之一，但其答案存在巨大的分歧。

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者，不仅仅是银行业的监管者，认为 2008 年之后的银行改革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银行通常可以有 30 倍的杠杆率，其它机构最多也就 25 倍左右（美国杠杆率比全球正常值更低，但计算方法不一样）。但我们被告知，银行业的监管当局现在并不关注整个银行业的资本要求，也即是说，短期内应该不会有新的巴塞尔协议（Carney 2016，强调）。但是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银行应该被要求拥有至少高于其风险暴露两倍多的自有资本，就像之前监管要求的。事实上，两倍也是保守地估计。真正令人敬畏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界有名的专家，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2010 年向时代周刊投稿批判巴塞尔协议 III（Admati et al 2010）。他们认为银行资产里至少要有 15% 的资本构成。从这项观点看，巴塞尔协议 III 允许四倍多的杠杆率，实在太高了。

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在 7 月份给 G20 领导写了三封信，他认为“规模最大的银行应被要求拥有比金融危机前最高值还要高 10 倍的流动资产”。对于这个观点，我非常困惑。如果资本监管放松，那么比完全放松时多十倍的流动性资产是一个有用的措施吗。

相比于危机之前，主要银行的杠杆率确实有所改善，但改善的幅度有限。英格兰银行的数据表明，英国主要银行的流动性资产在 2016 年相对于危机之前的五年多了 1.25 倍。即便是相对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也就多了 2 倍，远远达不到十倍的要求。

测量资本

从 CET1 的角度来看，危机之后银行变得更加有弹性。但这些比率的计算是基于资本的账面价值。但自有资本不是资产，不像资产那样容易计算。即使今天，在评估银行资产时，还会存在减值损失。当 IFRS9 改变了，减值损失将增加，资本将减少。

评估银行资产是股票市场分析师每个交易日的工作。一家银行市场市值反映了当前风险敞口的价值，减去债券持有人和储户的负债，加上未来利润的特许权超过资本成本的那部分价值。如果银行的市净率持续低于 1，就像一些欧洲的知名大银行，说明银行的账面价值以及监管的原则确实存在问题。当然，市场也可能出错，就像危机之前。但监管更糟糕，对损失的反应太慢。

总之，不要过于依赖监管来纠正价值，尤其是当市场价值/账面价值低于 1 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适合进行压力测试。但英格兰银行不愿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市场账面价值较低是由于预期现金流变弱，而不是资产的质量较低导致的。当银行现金流不足时，银行可以通过出售资产缓解流动性不足。但在金融危机时，各个银行纷纷抛售资产，资产价格不断下降，导致银行杠杆率上升。

成本——收益分析

如何解决有关杠杆率的分歧问题？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模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相应的成本合理是多少？金融时报记者曾说过，当收益确定时，社会成本将会是最小的。由于税收以及股东的缘故，对于银行来说，日益增加的权益/负债比将会导致成本上升，但这些对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成本。

资本过快的增长，将会成为社会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巴塞尔协议 III 要延长执行期。但资本随着时间稳健的增长，保持盈利而不分发红利，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对于稳健的银行来说，即使不发红利，投资者并不会过于困难。因为他们的红利只是被用来再投资了，当投资者需要现金时，可以出售一些股份。

结论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要被视为对过去 9 年来银行监管取得进步的一种批判。巴塞尔协议 III 确实比巴塞尔协议 II 取得重要进步，但它不是监管的终点，巴塞尔协议 III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中国银行业：无休止的“猫鼠游戏”使大银行受益

Alicia García-Herrero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随着中国领导层对去杠杆化目标规模的不断上升，银行面临更多来自监管机构的限制。因此，在不断发展的法规面前，银行开始进行非常有创意的“猫鼠游戏”。编译如下：

监管漩涡中不断变化的资金来源

当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门就开了。随着中国领导层对去杠杆化目标规模的不断上升，银行面临更多来自监管机构的限制。无论如何，这不是银行第一次发现自己处在监管的漩涡中。从使用回购协议到财富管理产品（WMPs）以及最新的可转让存款证明书（NCDs），银行在不断发展的法规面前，非常有创意地玩起了“猫鼠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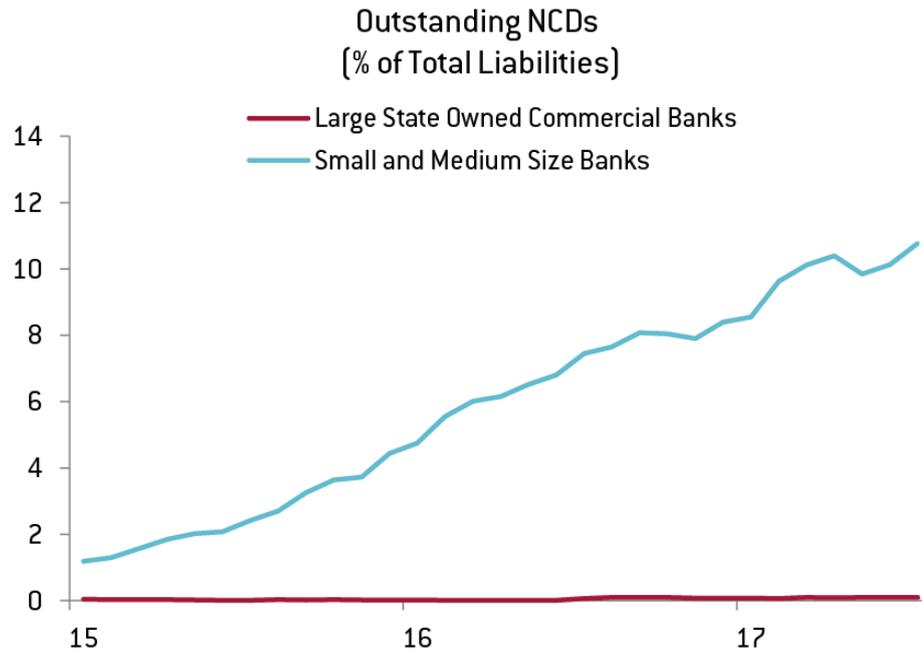
蓬勃发展的金融创新帮助中国的杠杆进程继续发展，杠杆有增无减。然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降低金融杠杆，流动性似乎变得越来越小，推高了融资成本。事实上，自 2015 年起，SHIBOR 已创历史新高，徘徊在 3% 左右。

监管压力比以前大得多

央行引入宏观审慎评估（MPA）来遏制经济中的金融风险，该评估以季度报告的形式呈现，评估框架从一开始就包括各种指标，如贷款增长和资产质量状况，评估结果较差的银行将受到融资成本升高的惩罚。

后来进一步扩大到覆盖表外 WMP（脱离负债表的理财产品）。由于净利息率下降，WMP 成为中小型银行增加财务杠杆、提高银行盈利能力的一种非常常见的方法。自从 WMP 被纳入到 MPA 以来，截止到 2017 年 5 月，银行的未偿还金额已经缩减了 1.6 万亿元，变为 28.4 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限制使用 WMPs 后，银行采取发行 NCDs（大额可转让同业定期存单）的方式作为最新举措。NCD 是短期、无抵押产品，且融资成本高于 SHIBOR。人民银行的监管导致了商业银行发行量的下降，但自 2017 年 6 月开始，发行量重新出现上升。其根本原因可能是银行缺乏其他选择，而且央行的规定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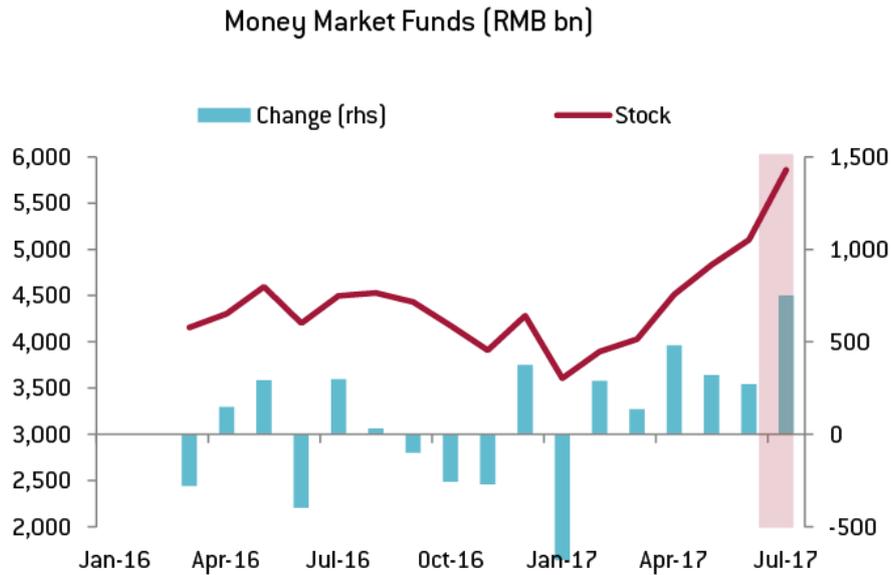
Source: Natixis, WIND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银行给予的压力对不同的银行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银行的短期流动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又使长期流动性受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五大商业银行（全部是国有企业）都是获胜者（具有政府的隐性担保，使他们能够从优质资产中获益），而其他的银行都是输家。

货币市场基金是新的中介机构

随着流动资金越来越昂贵，流动性稀缺的银行最近又重新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获得资金，即通过货币市场基金（MMF）获取流动性。虽然银行被要求减少同业拆借资产，但货币市场基金（MMF）相对较灵活。MMFs 作为中介，持有 NCDs，为零售和机构投资者重新包装产品。实际上，MMFs 在 2017 年 7 月份大幅增长，单月上涨 15% 至 5.86 万亿元。作为应对限制的措施，MMF 的规模从 2017 年 1 月占同业拆借市场的 6.4% 增长到 2017 年 7 月的 9.5%。截至 2017 年第二季度，MMF 中 19% 的投资流向 NCDs。

快速的扩张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流动性风险，特别是在四分之三的资产到期日不足 90 天时。直到 MMF 的规模逼近过去的 WMP 或 NCD，在这之前，这种监管漏洞下的套利方式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不用说，这只会为中国已经拥有很高杠杆的金融部门增加额外的财务杠杆。



Source: Natixis, AMAC

金融创新是银行业日益增长的成本

中国银行业新的融资手段的一大亮点是中国金融创新的另一个标志。虽然在不考虑既有环境的条件下，金融创新是积极的，但事实上，这种创新相关的风险确实需要仔细的评估。中国监管机构明显意识到，他们热衷于在中国人民银行的MPA中加入新的融资渠道。但是，这些做法只是在推动银行新的资金来源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此外，鉴于中国银行业国有股占较大比例，存款基数大得多，人民银行对资金的监管只影响到银行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小型银行正在为流动性而挣扎，但大型银行将从监管打击中受益。最新的2017年第二季度业绩证实了我们的预期，即大型银行可以从监管中套利，小型银行的风险正在上升。换句话说，银行业绩的改善不仅是因为经济状况好，而且也是由于部分银行从监管中套利。国有商业银行（SOCBs）的净利息率有所改善，但一般来说，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较小的银行里。这主要是由于影子银行的资金不断增加，而小银行则严重依赖影子银行。总体来看，银行业绩的改善不仅是因为经济状况变好，也有从监管中套利的因素。

本文原题为“Chinese banks: an endless cat and mouse game benefitting large players”。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是 Bruegel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9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会丧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遇吗？

Bates Gill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今年 11 月，特朗普总统即将展开对亚洲多国的国事访问。尽管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期待，特朗普至今却还尚未表态是否会访问东南亚国家。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及其内阁缺乏对东南亚事务的重视呢？作者认为，特朗普及其内阁有必要做出切实行动，来加强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否则，美国就有可能丧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遇。全文如下：

就在媒体普遍关注飓风和税改计划的新闻时，特朗普总统在专机上宣布了关于秋季对亚洲多个国家进行访问的若干决定。尽管公众媒体对这条新闻少有讨论，但对于所有关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的人而言，特朗普的言论都值得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

在接受采访时，特朗普明确表态他将会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但是，当记者问到总统是否会出席同期在越南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和在菲律宾举办的东亚峰会（EAS）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答。对于 APEC 峰会，特朗普表示“可能会去”；而对于 EAS 峰会，特朗普则表示“到时候再看吧”。至于东盟峰会（ASEAN），特朗普则更是只字未提。

考虑到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特朗普突出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当然是很有必要的。而由于习近平主席今年 4 月已经在海湖庄园邀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当然也会在这次亚洲之行中访问中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就有理由忽略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

在今年早些时候，副总统彭斯在访问东盟总部时宣称：“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是战略性伙伴关系，我们之间拥有横跨经济、安全和人文交往等领域的紧密联系。”他同时也向东盟秘书长承诺：“特朗普总统已经确认，将会出席今年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不仅见证了美国和东盟长期的友谊，也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双边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最终选择不访问东南亚诸国，那将意味着美国不仅错失在东南亚的战略机会，还背弃了对东盟国家的承诺。

东南亚位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这一地区对于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总统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无疑可以加强美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友好关系，重申美国对维护区域内国际秩序的承诺；同时，总统的访问也将会促使美国国内各界加强对

东南亚区域事务的重视，为本届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定下基调。为了达成这些重要的目标，总统及其内阁有以下几件工作需要完成：

首先，在总统访问东南亚之前，美国国务卿有必要发表一次高规格的谈话，重申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与诉求，并对总统本次国事访问将取得的外交成果提出期望；

其次，在访问过程中，特朗普总统需要依次邀请十个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在2019年访问美国，并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东盟-美国特别领导人峰会。另外，特朗普总统也应该在多个场合重申对加强美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愿望，并承诺继续出席2018年举办的东盟、东亚及APEC峰会。

最后，在结束访问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牵头起草一份跨部门的东南亚事务方案，落实总统在访问中提出的各项期望。这项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发起在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合作计划；
- 增进东南亚资本对美投资的机会；
- 扩大国务院在雅加达东盟总部的外交业务范围；
- 落实2015年签署的美国-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外交合作、安全合作及人文往来走向常规化、持久化；
- 向依旧处于转型进程中的缅甸提供更多的政治和发展资源，确保其成为一个独立、稳定、民主、经济繁荣的成功国家；
- 投入必要的外交资源，进一步加强与泰国和菲律宾的盟友关系；
- 承诺与东盟国家伙伴一道，在海事安全问题上加强紧密合作，并且对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支持，以帮助其加强在海洋情报、海事巡逻、海上执法以及海洋资源保护方面的综合能力；
- 与东南亚及周边地区的盟国（如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及日本）和安全合作伙伴（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加强多边军事合作，增加美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军事训练和联合演习的次数；
- 继续定期召开东盟十国与美国间的国防部长高峰会议（ADMM+1）；
- 扩大与越南的国防与军事合作，举行更多的两国军舰互访活动，并尝试开展美越两军间的联合演习；

- 号召区域内各国携手合作，确保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事实上，以上这些举措都是华盛顿的政策界人士——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广泛认同的。特朗普总统只需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在东南亚事务上的这些举措能够在国会赢得广泛的支持，这无疑是特朗普所乐于看到的局面。

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副总统彭斯的发言：“特朗普总统和我都将坚定地重申美国对东盟各国的支持，同时，总统本人也期待着与你们在今年 11 月的峰会上会晤。”

希望特朗普不要忘记他对我们的东盟伙伴做出的承诺。

本文原题为“Strategic opportunity lost?: where is the White House on Southeast Asia?”。本文作者 Bates Gill 是资深亚太安全问题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原文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发表在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怎样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Eli Beckman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一段时间以来，朝核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半岛局势似乎正在朝着不稳定的方向迅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如何采取战略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美国又有哪一些方案可以选择？作者给出了分析。全文如下：

近几年来，朝鲜核武和洲际弹道导弹水平的飞速发展，使之日益接近拥有对美国本土进行核威慑能力的战略目标。从目前的情报来看，朝鲜显然已经有能力对阿拉斯加发动核打击，而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朝鲜的弹道导弹也迟早能够打到美国本土。

多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一直苦于寻找在不危及地区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应对朝鲜挑衅的方法。而中国面临的困境也是相似的：他们既不喜欢朝鲜激进的挑衅行为，但也不希望任何一方采取行动危及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战略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朝鲜虽然令人讨厌，但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战略缓冲区，以防止中国和美韩势力在半岛爆发直接冲突。

传统的国际分析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不能容忍朝鲜的存在，而中国亦不能接受朝鲜政权的垮台。但是，这种老旧的思维方式已经被证明丝毫无助于打破目前的僵局。现在，我们有必要解放思想，与中国一道寻求能被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妥善应对朝鲜问题。

现在，摆在各方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由中国出面，对朝鲜发起严厉但不完全致命的经济制裁，禁止包括石油在内的一切贸易，从而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朝鲜的国民经济面临严峻考验，金正恩将别无选择，被迫将主要精力转向应对国内危机，并且放弃对外挑衅。当然，有些人会质疑：“如果金正恩在这种环境下发动对外战争，并且试图转移国内矛盾呢？”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在缺乏石油和资金的前提下，金正恩无力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至于把首尔化作一片火海，或者用核导弹将洛杉矶化为灰烬呢？这些选项对于经济制裁来说，未免是一种过于过激的反应。

通过这种制裁的方式，中国能够迫使朝鲜重新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频繁发动对外挑衅。另外，虽然经济制裁不会使得朝鲜立即放弃其核武计划，但严厉的制裁有助于迫使朝鲜当局认清核武计划的高昂代价。如果制裁的效果足够好，金正恩甚至有可能被迫向外界低头，以放弃核武为条件换取对外开放和经济援助。此外，如果朝鲜低头，美国也会在地区内相应地减少军事力量部署，从而减轻中国的战略压力，并使得东北亚日益紧张的安全环境趋于缓和。

但是，上面这条路只有在金正恩保持理智，不对外做出过度挑衅的前提下才能行得通。如果金正恩真的再度悍然挑衅，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那么，各方就必须考虑其他选项了。

中国固然不会放弃对朝鲜安全的保障，但如果朝鲜的威胁越来越不可控制，我们或许可以说服中方接受一个不由金正恩掌控的朝鲜政权。这样一来，朝鲜依然是中国与美韩之间的缓冲区，而朝鲜的核威胁也会相应地被消除。

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判断朝鲜即将对外发动战争，这种设想就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与其坐视东北亚陷入战火之中，中国很可能选择与美国及其盟国携手，在对朝鲜政权的继承者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采取联合行动促使朝鲜政权的垮台。这样一来，战争的爆发将不可避免，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将会丧命。然而，这样的结局总好过由朝鲜率先开战带来的彻底失控的局面。半个多世纪前，正是由于多方势力缺乏沟通，不断升级的战争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但这次，由于中国事先得到承诺将会在战后的朝鲜政权重建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战争将不会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如果中国不与朝鲜站在一起，金家政权将在战争中迅速垮台，而半岛重建工作也将随即展开。那么，在战争之后，中美双方将达成怎样的协定呢？一种可能是美军立即撤出朝鲜，中国接手朝鲜的战后重建，对朝鲜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在朝鲜建立起更加开放的、无核化的新政府。由于中美双方都不得在朝鲜部署军队，美国 and 韩国不必担心新的朝鲜政府沦为中国的傀儡。而由于主导了朝鲜的战后重建，中国也不用担心在东北亚失去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接触了朝鲜的核武装，却不能换来对朝鲜新政府的掌控权，美国 and 韩国固然是感到非常不甘。但是，和目前这个拥核且极度危险的朝鲜政权相比，相信任何理智的人都能权衡孰轻孰重。

另一种可能的方案，则是在战后实现半岛统一。尽管彼此间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朝鲜和韩国人毕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实现半岛统一也是无数朝鲜和韩国家庭的梦想。在这种情景下，韩国将会主导朝韩统一进程，并且大幅提高朝鲜人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要说服中国同意这一方案可谓是十分艰难。要说服中国相信美国驻军不会在统一后的韩国靠前部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此外，美军也很可能不得不从统一后的韩国撤军。那么，这种方案最终会给世界带来哪些后果？首先，当今世界最为严峻的地区安全风险将被终结，半岛也将迎来朝韩人民期盼已久的统一。此外，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潜在冲突将被化解，而驻扎在韩国的三万美军官兵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无论最终采用哪种方案，这些愿景的实现都离不开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多方势力的紧密协同。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尽管两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反

复强调管控矛盾，但实际上，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篡位者和挑战者，而中国则认为美国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遏制和打压中国。不过我们仍然有必要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冲突，但朝核问题却是双方难得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中美两国都不希望朝鲜局势继续朝着不稳定的方向恶化下去，而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只要能够找到一条在不危及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朝鲜核问题的道路，中美两国都有充分的动机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合作。

有人可能会批评说这些方案充满了帝国主义干涉的气息，但我们必须正视苦涩的现实：朝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一旦朝核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不稳定因素就会烟消云散，而整个东北亚局势也会随之趋于稳定。从长远来看，全世界都无疑将得益于此。

本文原题为“[How Trump could ‘solve’ North Korea](#)”。本文作者 Eli Beckman 是资深国际政治分析人士、专栏作家。原文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发表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朝鲜核试验蔑视特朗普的“怒火”

Scott A. Snyder/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此次试验朝鲜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其对特朗普“怒火”警告言辞的反抗。2017年9月5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朝鲜核试验蔑视特朗普的“怒火”》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特朗普“怒火”言辞兑现与否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行第二次制裁后，中、美、俄将要面临的状况；尤其是美国在承认朝鲜是核国家与进行“灾难性”军事冲突之间的两难选择。具体编译如下：

朝鲜在公开展示一个完全“自制”的核装置后，声称它具有“巨大的破坏力”。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这次核试验产生了6.3级地震的效果。这次核试验，伴有美国放弃对朝鲜“敌对政策”的要求，直接违背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警告，即朝鲜核威胁将会遭受“怒火，坦率的说是一种在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力量”。

如果特朗普总统遵循他的言辞，美国将卷入马蒂斯国防部长所说的“灾难性”的军事冲突，要永久地结束朝鲜的威胁。这样的冲突可能会耗尽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并彻底改变政治格局；另外，它可能不会缓解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困境，反而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特朗普成为一名战争总统，那么国会内部对有关特朗普领导能力的公开质疑都会被放大和强调。

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不遵守他的言辞，一方面他将被视为纸虎，而且他利用总统职位发挥有效指挥的权力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他在全球的声誉会受到打击，人们认为他与克林顿和布什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朗普想在处理朝鲜第六次核试验的事情上与奥巴马有所不同，因此认为仅有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升级危机，以确保避免朝鲜政府引诱美国陷入危机使得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国会对扩大对朝鲜的第二次制裁制度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针对与朝鲜有商业利益的中国对手。他们还支持采取单边金融措施，更积极地切断对朝鲜的资金流动，尽管联合国现有的制裁措施实际上已经将朝鲜隔离开来。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没有理由再反对美国的自卫措施。但是，实际上要实施这些制裁的任务，需要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合作。

除了对煤炭和海产品的禁令，中国与俄罗斯还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去接受石油禁运和切断对朝鲜劳务输出的支持。这些措施可能会给朝鲜领导层带来额外

的经济痛苦和孤立，他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应对。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传言称金正恩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石油储备，以应对国际石油禁运对朝鲜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特朗普越来越不占有时间的优势。

对朝鲜采取常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体会遇到各种障碍。从韩国撤离外籍人员和加强驻韩美军的部署工作需要几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有可能引发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此外，韩国总统文在寅坚持，如果没有韩国的同意，朝鲜半岛不会发生任何的军事行动。朝鲜可能指望韩国能够阻止美国单方面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平壤的报复可能会造成韩国多达 100 万人口的伤亡。而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可能同样会面临朝鲜报复的风险。

最终，特朗普总统会和金正恩对话，甚至有可能默认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的现实。显然，朝鲜正在利用这些核试验来塑造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但是，迄今为止金正恩没有与其他国际领导人有任何互动，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愿意谈判接受妥协或者作出让步。

朝鲜的第六次核试验促使美国在两个不可接受的战略之间进行选择：默许朝鲜成为一个核大国或者发起“灾难性”的军事冲突，永久结束朝鲜的核威胁。即使朝鲜被承认为核国家，也不能确定金正恩的脆弱感会减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金正恩的脆弱感不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这应该就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标。

本文原题为“North Korea’s nuclear defiance of Trump’s ‘fire and fury’”，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韩政策项目研究主任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 2017 年 9 月 5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对朝政策的下一步

Bruce W. Bennett/文 章珏/编译

导读：朝鲜在7月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这两次导弹试射表现出了似乎可以打击美国的军事实力。随着朝鲜威胁的上升，美国宣布放弃战略耐心做法。本文作者认为，考虑到金正恩的主要关切在于政权生存，在放弃战略耐心做法后，美国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军事行动威胁和散布破坏朝鲜内政的信息，以此说服金正恩回到谈判桌，使其认识到放弃与国际社会合作对其政权生存并无益处。编译如下：

近几周，美朝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牵动着国际社会。认为自己无法忍受日益严重的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美国决定终止战略耐心的政策。

随着7月4日和28日两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朝鲜似乎迈出了可以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第一步。马塞诸塞州研究院的物理学家 Postol 表示，朝方关于这两次成功试射的夸张描述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担忧。

7月4日的导弹试射，似乎表现出了足以覆盖阿拉斯加州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射程，却可能并没有携带一个足够重到可以装载朝鲜核武器的弹头。28日试射的导弹射程似乎可以覆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弹头肯定太小。Postol 和他的同事认为朝鲜可能提前烧毁弹头来减轻弹头重量以获得更远的射程。

几十年来，美国已将“核保护伞”覆盖了日韩两国，以此针对朝鲜对这两国使用核武器。因此日韩两国无需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直到目前，美国该承诺尚未将本国领土陷于危险之中，但是，除非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计划得到控制，不然的话，在未来某时，朝鲜终将有能力对美国的大城市实施核打击。

即使是一个拥有10千吨爆炸当量的当代核武器（规模大致与广岛爆炸的核武器一致），若是被投放在美国的某个大城市，也会造成几十万人员的伤亡。而朝鲜现在正在发展被称为“H型炸弹”的更大的核武器，当量达到50千吨，能造成50多万人口的伤亡。

若朝鲜的核武器可以打击美国的城市，那么美国核保护伞的承诺又能兑现多少，许多韩国专家已经对此表示担忧。上个世纪60年代，面对当时苏联的核威胁，法国总统戴高乐表示，他不相信美国会为了巴黎而牺牲纽约。同样的道理，在未来，美国会为了首尔而牺牲旧金山或纽约吗？

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结束对朝鲜核威胁的“战略耐心”做法。这一做法下，美国对朝鲜发展核武施加了一些压力，但仍允许其威胁不断

扩大，也不愿破坏地区和平。蒂勒森表示，“美国正在探索一系列新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措施，所有的选项都在桌子上。”

最近朝鲜核威胁的升温引发了一些问题，因为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防卫韩国的承诺就很重要，未来将会更加关键。朝鲜军队和安全部队的人数规模可能已经是韩国的三倍。考虑到朝鲜的军队在质量上处于劣等，所以存在一定倾向希望韩国放弃自己在军事质量上的优势。但是韩国的军队人数正在危险性地缩减，十年内，军队现役人员数已从 56 万减少到今日的 48.5 万。在未来的 3 至 5 年内，考虑到韩国历史性的低出生率和现任总统文在寅关于减少服役时间的提议，这一人数可能下降到 37 万。在十年内，韩国军队人数可能跌至 30 万。

虽然韩国的军事质量优势可能保证其在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军队的绝对人数可能在某些战斗中更加重要，特别是对抗那些主要战役结束后兴起的反叛势力。2003 年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就面对类似的问题：一旦主要战役结束，美国就需要扩大军队规模来应对反叛势力。据称，朝鲜拥有 20 万现役特种部队，虽然他们的能力无法与美韩匹敌，但是其隐藏的军事文化将使他们在叛乱环境中变得难以对付。

虽然朝鲜的许多武器是老旧的，且无法很好地应对美韩军队，但是一旦美韩军队的武器供应被耗尽，联军将失去其大部分的质量优势。

此外，朝鲜具备一些军事优势，在这些优势领域，数量可能显著战胜质量。包括其大型弹道导弹部队，大规模炮兵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例如，朝鲜可能在首尔大都会的射程范围内部署有大约 5 千到 6 千台大炮和火箭发射器。其中的一部分若是对准了首尔，就会造成实质性的破坏。对此，韩国将会采用升级手段，例如摧毁金家政权。

自 1948 年执政以来，金家政权已积累了一定的军事能力来对抗美国的颠覆行动。许多从理论上认为可以阻止朝鲜发展核武的选项都是不可行的，比如由中国部分执行的经济制裁和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可能上升为区域大型战争）。美国也可以威胁使用反导系统来击落朝鲜的试射导弹。

许多专家认为，解决威胁的最好方法是说服朝鲜进行谈判来结束其核武计划。但是朝鲜已经明确表示它没有意向放弃发展核能力。有卡扎菲作为前车之鉴，朝鲜坚持认为核武器对于维持其政权生存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美国想要朝鲜参加谈判，那么它必须说服金家政权，使其相信放弃与国际社会采取合作而选择制造核威胁，将更可能造成其政权毁灭。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是实施必要压力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必要措施还包括针对朝鲜内政的信息操作。为达到上述目标，美国应考虑向朝鲜传播诋毁和破坏金家政权的信息。

金正恩的主要关切点在于政权生存，他似乎对任何威胁都极度敏感。据报道，他采取的清洗等野蛮行径已经疏远了许多朝鲜精英。金正恩在很多方面被视为一个弱势领导人，也不是朝鲜最有能力的人。据说是其祖父金日成在 50 年代颁布的社会主义者和“自力更生”哲学的要求，随着许多精英成为商业人士，得益于资本主义，朝鲜的经济似乎正在增长。

朝鲜已经“毫发无伤”地跨越了美国曾经设立的“红线”。美国应考虑追求采取综合措施，包括经济制裁、军事行动威胁和散布破坏内政的信息，以此说服金正恩，其核武计划只会危害其政权。

本文原题名为“Beyond strategic patience with North Korea: what comes next?”。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 Bruce W. Bennett。本文刊于 2017 年 9 月 8 日 RAND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

Scott A. Snyder/文 刘立群/编译

导读：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特朗普借朝核试验的余热未退，于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讲话，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朝美对话的关注。2017年9月22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官网发表文章《特朗普的言论战与金正恩的回应》一文，作者主要分析了朝美关系的发展进入沸点状态、特朗普与金正恩存在巨大的沟通风险以及朝美将继续对话等内容。具体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唐纳德本周在联合国发表了强调主权与自卫重要性的独立讲话。特朗普的讲话除了激烈的言辞表述以外，涉及到很多吸引朝鲜金正恩的主题。特朗普宣称：“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如果被迫捍卫自己或盟友，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摧毁朝鲜。”

没有人会在面对威胁时选择退缩，金正恩针对特朗普的侮辱性语言发表了前所未有的个人声明，声称他“将认真考虑采取历史上最慎重、最高等级的强硬对策”。"朝鲜外交部长暗示朝鲜有可能会在太平洋上空进行核试验。

如果说这场口水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现在有了直接的互相关注，尽管处在相互谩骂中。

沸点

但是现在，美朝关系的温度似乎已经达到沸点，迫切需要扩大外交对话以防止误判增加风险，并且要在双方之间建立清晰的核威慑基本准则。

过去十年来，朝美外交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朝鲜以放弃无核化为目标，而美国却坚持实现朝鲜无核化。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已经明确将核发展作为国内合法化的来源，成为解决其国家军事弱点的方案。另外，核发展成为与朝鲜进行谈判、对话必将涉及的内容。

但是，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交流要注意两人之间存在沟通不畅和词不达意的风险，以及扩大带宽应对危机的必要性。

巨大的沟通风险

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误解反映在他的言论中：“火箭人正在为自己和他的政权执行自杀式的任务”，原因有两个。首先，金正恩试图通过消除他对外部攻

击的脆弱性而生存下去；其次，特朗普的言论构成了对朝鲜领导人的直接挑战，即没有人可以侮辱金正恩的“最高尊严”。

但是，金正恩显然无法把握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威胁的认定程度，或者其他暗示美国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言论。

尽管金正恩希望在核发展方面与美国比肩，但是一旦明确朝鲜拥有直接打击美国的核能力，那么由于朝鲜的误判带来的战争风险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这是由于对双方意图误解、对朝鲜核原则不确定性，以及对如何防止对方采取最坏举动的过度放大。

减少误判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有关对方如何看待另一方挑衅行为的交流。

继续对话

在近期内，朝美两国有可能坚持采取一些列的行动，这些行动有可能对朝鲜核国家定位的未来谈判产生影响。因此，朝鲜将继续进行核测试，而美国则继续执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双方都越来越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以帮助应对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风险。两国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用来塑造双方谈判的结果。不过，依然需要建立牢固的沟通渠道，以此作为减少意外战争造成风险的手段。

至少，特朗普和金正恩需要找到一种继续对话方式，他们现在开始关注在尽可能非公开与非夸大的形势下如何减少对双方的误解与核误判的风险。

本文原题为“Trump’s war of words and Kim Jong-un’s response”，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韩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韩政策项目研究主任 Scott A. Snyder。本文刊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